

《赫索格》中的代际创伤与记忆书写

Intergenerational Trauma and Memory Writing in *Herzog*

刘兮颖 (Liu Xiying)

内容摘要: 贝娄的经典长篇小说《赫索格》中的同名主人公赫索格遭遇来自家庭和犹太历史的代际创伤，前者是他在现实生活中遭遇到的，后者则与其族裔身份乃至历史记忆有关。无论家庭代际创伤还是历史代际创伤都与他的身份危机密切相连，创伤记忆造成了赫索格的身份认同危机。从赫索格面对心理创伤时采用的应对措施可以发现他经历了几个不同的阶段：回避问题、自我否定、创伤叙事、找寻自我，其中创伤叙事对于疗救赫索格的精神危机尤为重要。真正帮助赫索格治愈精神创伤并找寻自我的是他的家人以及早年全部的家庭记忆，后者以代际传递的方式影响着赫索格的伦理选择并重新建构了他的身份。家庭记忆的代际传递对赫索格精神创伤的复原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关键词: 《赫索格》；代际创伤；记忆书写

作者简介: 刘兮颖，华中师范大学文学院副教授，主要从事英美文学研究。本文为国家社科基金项目“20世纪美国犹太文学中的记忆书写研究”【16BWW063】的阶段性成果。

Title: Intergenerational Trauma and Memory Writing in *Herzog*

Abstract: Herzog, The eponymous hero in Saul Bellow's classic novel *Herzog* encounters the intergenerational trauma from both the family and the Jewish history. He encounters the former in his real life and the latter is closely related to his ethical identity and even the historical memory. Both his family generational trauma and his history generational trauma are intimately linked with his identity crisis. The trauma memory leads to Herzog's identification crisis. In view of the resolution measures while Herzog is facing his psychological trauma, the reader can discover several phases Herzog experiences: evasion of the problem, negation of self, trauma narration, pursuit of self. Among them, the trauma narration plays a vital role in treating Herzog's spiritual crisis. It is his family members and all the family memory of his early life that really assist Herzog in curing his spiritual crisis and the pursuit of his identity. His family memory influences Herzog's ethical

selection and helps reconstruct his identity through the way of intergenerational transfer which has a crucial function in the recovery of Herzog's spiritual trauma.

Key words: *Herzog*; intergenerational trauma; memory writing

Author: Liu Xiying is Associate Professor at the School of Humanities, Central China Normal University (Wuhan 430079, China). She specializes in the study of European and American literature. Email: longlongw@126.com

诺贝尔文学奖得主索尔·贝娄 (Saul Bellow, 1915-2005) 的经典之作《赫索格》这部小说本身具有开放性和多义性, 目前学界已有无数的阐释和解读方式产生。国内外的研究者着眼于赫索格遭遇的精神创伤, 本文试图深度解析家庭的代际创伤给予摩西·赫索格的深刻影响, 尤其是记忆如何重构了他的身份和生活道路。美国学者彼得·莱文曾指出: “记忆形成了自我认同的基础” (9)。赫索格的家庭记忆塑造了他的情感依恋模式, 并在他治愈精神创伤的过程中起到了积极作用。通过对于家庭生活的回忆, 赫索格联结了自己的过去、现在以及未来, 尤其是与苦难深重的犹太民族共同体相融合并进行自我反省之后, 他做出了自己的选择, 不仅平复了创伤记忆, 还激发了坚韧向上的乐观主义精神, 重获安宁平稳的生活。

一、代际创伤与赫索格的身份危机

赫索格所遭遇的代际创伤来自家庭和犹太民族史两个方面, 前者是他在现实生活中遭遇到的, 后者则与其族裔身份乃至历史记忆有关。无论家庭代际创伤还是历史代际创伤都与他的身份危机密切相连, 创伤记忆造成了赫索格的身份认同危机, 进而影响到他的伦理选择。代际创伤涵盖以下内容: 其一, 家庭里的父辈与子辈两代人均遭受相似的精神创伤, 这种创伤记忆具有代际性、传递性和类似性。心理学家的研究表明, 儿童期创伤的效应会持续到成年期。小说中赫索格的父亲乔纳遭遇好友的背叛和出卖, 经受了被欺骗而产生的痛苦悔恨悲伤等心理折磨。创伤不仅仅存在于唯一的直接受创者父亲身上, 在非直接承受者少年赫索格的心理上也有所投射, 给予了他无比深刻的创伤记忆。家族秘而不宣的精神创伤在后辈心理层面会得到再现, 造成了非直接承受者的精神危机和伦理困惑。其二, 家庭代际创伤具有历史性和形而上的意义, 与赫索格的种族以及移民身份密切相关。在治愈代际创伤的过程中赫索格不仅对于父辈的移民身份有了更为深刻的理解, 而且将自我身份的建构延展到宏大的犹太历史中去, 从而具有了悲天悯人的情怀。

赫索格遭遇的代际创伤首先来自于父亲乔纳的被骗和受辱事件。乔纳和朋友沃伦斯基一起向放高利贷的人借钱卖私酒, 结果还没有抵达边界就被人抢劫一空, 父亲被人暴打一顿伤情惨重。出人意料的是父亲后来发现这次抢劫是沃伦斯基与那班强盗勾结在一起实施的。这突如其来的创伤事件摧毁

了父亲的日常生活，伦理秩序和规则被破坏，也使得过往的伦理关系失去了合理性和存在的价值。根据《精神病学通论》（*Comprehensive Textbooks of Psychiatry*）所述，所有心理创伤的共同之处在于，这是一种“极度恐惧、无助、失去掌控力和面临毁灭威胁”的感觉（转引自赫尔曼 30）。父亲遭遇创伤事件后经历了如下几个阶段：首先，质疑加害者是犹太同胞和朋友沃伦斯基，但是遭到了妻子的坚决否定。接着，出于各种难以言说的缘由，隐藏受辱憋屈的心理，开始哭述自己的受难史，发泄苦闷的心情。最终，作为沃伦斯基的恩人和好友，父亲选择不再追究他的罪责，保持了终身缄默。

父亲为何沉默不语？他的内心深处对于好友的背叛持怎样的想法？作为儿子的赫索格由始至终对此一无所知。小说中写道：“当父亲发现，原来是沃伦斯基与那班强盗勾结在一起进行抢劫时，他的内心的感觉究竟怎样呢？他从来没有说起过”（249）。父亲的沉默意味着这已成为家庭生活中心照不宣的秘密，不再触及创伤，仿佛这件事情从未发生过，能够自动地从日常生活中隔离出去。由于叙述者采用了第三人称有限视角进行叙事，读者只能从赫索格的视角窥探父亲的不作为，揣测其原因，却与赫索格一样发现父亲的沉默是一个无法解说的谜题。沃伦斯基与父亲不仅是好友，后者更是前者的恩人，在沃伦斯基落难之际收留了他，却没有想到他以怨报德，出卖了自己。他们彼此之间的身份发生了逆转，伦理关系出现了彻底的翻转。沃伦斯基从患难与共的朋友变成了加害者，父亲从恩人变成了受害者。沃伦斯基的欺骗和背叛毁坏了两人之前和谐友好的情谊，粉碎了人与人之间的信任感。创伤以身体记忆的形式镌刻在父亲的脑海中，“门牙开了个缺口，外套已被撕破，衬衣和内衣裤上都沾满了血迹”（196）。衣物可以替换，然而被打落的牙齿——身体记忆时刻提醒父亲经受的背叛、凌辱和折磨。

从最初遭到重创之时落泪的心酸到后来的沉默不语，父亲是否经历了失眠、梦魇、愤怒、羞耻、内疚、悔恨、哀伤，赫索格已不得而知。父亲的回避其实符合创伤后应激障碍症状之一——禁闭畏缩。“当一个人感到彻底地无能为力，任何形式的抗拒也已经无望时，他可能会进入屈服放弃的状态”（赫尔曼 38）。换句话说，受创者会产生精神上的麻痹无感，由此会避免任何时候回忆起过去的创伤，这当然可以规避再次触发创伤的风险，但与此同时也意味着错失了重构积极生活的契机。究其缘由，大概包括以下几方面：其一，父亲心存善念，他不愿意对犹太同胞实施报复行为。对沃伦斯基的否定和谴责也意味着对自己之前善行的彻底否定，这件事将让孩子们见证父亲的愚昧无知、识人不清和悔不当初。这恰好是身为人父的乔纳无论如何不愿意承认的人性的弱点，他的羞耻感阻止了自己。其二，父亲认为隐瞒真相对于孩子们身心的健康发展至关重要，他力图为他们创造出一个富有安全感的环境，保持对人性良善友爱一面的坚守；其三，父亲想要重新回归正常生活，不再追究往事。见证了人性阴暗面之后的父亲保持着沉默，然而沉默并不意味着

遗忘，更不表示原谅；其四，回避表明父亲企图以自己的方式抵御痛苦，因为再现创伤记忆有可能令人情绪崩溃，让人重新体验到难以忍受的折磨，人们将被不可阻挡的冲动所摧毁。从另一个角度而言，这是自我保护的手段，他没有选择发泄怒火到无辜的家人身上。但彼时的父亲并没有意识到创伤事件带来的代际性影响。当儿子赫索格遭遇同样的创伤性事件时最初采取的处理方式——回避问题几乎与父亲如出一辙。赫索格最初甚至迁怒于告知自己真相的朋友阿斯弗特，认为对方在撒谎。承认事实意味着赫索格对自己智商的否定和自尊心的摧毁，在他者眼中被戴绿帽子的丈夫绝非正面形象，受骗者这一身份本身足以证明他交友不慎、愚不可及。所以他压抑自身的情感表达，否认被欺骗的事实。

从另一个角度而言，不仅父亲在这场意外变故中深受其害，整个家庭都受到沉重打击，孩子们目睹父亲的惨状后不禁伤心落泪。赫索格在精神上也因此打上了创伤记忆的深刻烙印。小说中写道：“我难过得再也忍不住了，居然有人敢对他动武——他是父亲，是个神圣不可侵犯的人，是个国王。我的心都快要被这可怕的事窒息了。我以为我会因这事厥死过去”（197）。在年幼的赫索格心目中，父亲不仅是父性权威坚不可摧的存在，更是全家的庇护者，为家庭提供物质保障。父性权威代表着稳定的秩序、强大的力量以及无可替代的榜样，赫索格是父亲的崇拜者，他从父亲那里获得精神支持。当他发现一直以来的父性权威居然受到了挑战并且被暴力殴打的时候，意识到一个无可争辩的事实，父亲由强者变成了弱者，他不再是神圣不可侵犯的，外在的异己力量能够摧毁一切。他感到害怕、恐惧和无助。彼时少年赫索格还不明白这种异己力量来源于何处？为什么身为犹太人要过着如此颠沛流离的生活？除了血缘亲情，父母给予他的究竟是什么？可以肯定的是，少年赫索格对自己身份的建构并没有确切的认知，更不可能洞察到他者眼中的族裔身份在社会生活中被接纳的程度及其遭遇到的各种困境。他找不到合适的方式表达自己愤怒悲伤焦灼的情绪，只能痛哭流涕，为父亲的无辜被打和自己的无能为力而感到伤心难过。这是父性权威坍塌的时刻，也是一个令儿子无法接受不知所措不可理喻的时刻。作为父亲创伤的目击者，赫索格也遭受了沉重打击。然而，当创伤事件发生的时候，赫索格的父母并没有及时疏导孩子们惊恐不安的情绪，他们自顾不暇，也全然没有意识到这件事会对小儿子赫索格造成极大的心理创伤。“虽然创伤症候群有许多固定的特质，但不会在每个人的身上都相同”（赫尔曼 53）。与兄弟姐妹们相比，赫索格受到的创伤尤为深重。显然在同一创伤事件中，个体的差异反应起到重要作用。他的兄弟姐妹们成年之后都迈入了富有的中产阶级行列，有着稳定的职业和家庭生活。他们属于抗压能力较强的人，具有积极的处事态度和成熟的社交能力。这样的人会较少出现创伤后应激障碍的症状。在赫索格童年时代封闭狭小的家宅空间里，混乱的生活环境容易造成父母对于孩子情感上的忽略。与

此同时，父母与孩子们之间会产生相互的认同感，孩子会感知父亲的创伤，而父母也为了孩子努力奋斗谋求生存之道。这能够强化彼此的安全感和依恋感，但也造成了父母与子女之间边界的模糊。

如果说年少之时的赫索格因父亲的身体受伤而痛哭的话，那么成年之后的他回首往事时对于父亲由始至终保持非同寻常的沉默感到震惊和不解，直至多年以后遭遇同样背叛和欺骗的赫索格才能够对父亲被背叛的痛苦和愤怒感同身受。代际创伤在赫索格身上的表征极为突出。此时的他对于身为美国犹太移民有了更为深刻的感悟，他认为受害者“有的哭出声来，有的默默地咽下伤痛，关于后者，你可以写一部人类的内心活动史”（249）。那些未曾说出口的心灵创伤阻碍了人们对被背叛的痛苦和愤怒进行开诚布公的交流。可以肯定的是，在赫索格看来父亲遭受的创伤不仅是肉体上的，更是心灵上的。对于很多受创者而言创伤本身无法言说，不能言喻的伤痛才是最深刻的记忆。

一般认为，创伤者的后代有可能获得创伤后的成长 (Tedeschi & Calhoun 456)。然而，赫索格并没有从保持缄默的父亲那里习得积极面对创伤的方式。恰好相反，他从父母那里习得了应对创伤的防御机制，这对日后赫索格与他人之间亲密关系的建立起到了一定的消极作用。当赫索格的婚姻出现问题时，他并没有寻求积极的解决方案，而是试图以视而不见的态度消解它或者将所有责任推卸到他人身上以期获得心理安慰。赫索格在离婚事件中感受到巨大的创伤，因为“自我与现实之间失去了平衡，统一性被打破，自身的连贯性也被割裂了”（赵静蓉 146）。他从原本和谐融通的环境中体会到突如其来的分裂、至亲好友的背叛。受创者赫索格被那种既期待又害怕受到羁绊和伤害的矛盾心理所折磨。首先是他周遭的伦理关系遭到彻底的毁坏。马德琳背叛了他们的婚姻，造成了夫妻关系的解体；格斯贝奇背叛了他们的友谊，造成了朋友关系的分裂。其次，他们各自的伦理身份发生了极大变化。马德琳从妻子变成前妻，格斯贝奇从好友变成情敌，而赫索格则由丈夫变成前夫。最后，作为受害者的赫索格在创伤发生之前的身份认同感也被摧毁。从前意气风发的大学教授变成了落魄的失婚者。小说中，赫索格数次以“待罪的羔羊”（142, 230）自称，显然他认为自己是马德琳与格斯贝奇婚外情的替罪羊，他所有的苦难均源于此。赫索格甚至对自己的犹太族裔身份和美国公民身份产生了深刻的怀疑。

由上面的分析可以看出，赫索格与父亲在性格、外表、人生经历等诸多方面存在着颇多的共同之处：其一，他们都与人为善以诚待人，推心置腹地对待朋友。其二，在不知情的情况下遭到知心好友的背叛。父亲遭遇的是物质损失和肉体上的创伤，而赫索格本人遭到了情感上的双重背叛。其三，面对朋友的背叛和出卖，赫索格和父亲都遭受了打击和创伤，而他们最初都采用了相似的应对策略——回避问题。从赫索格处理问题的方式可以看出他受

到了家庭代际创伤的影响，父亲曾以同样的方式处理被背叛和被欺凌的难题，保持了表面的和谐，维护了自我的尊严。赫索格在潜移默化中沿袭了父亲为人处事的冷峻作风。

作为具有犹太族裔身份的父亲乔纳和儿子赫索格，他们都在不同程度上受到了代际创伤的影响。这种代际创伤不仅来自于家庭，更经由历史记忆而来，镌刻在犹太后裔的灵魂深处，铸成了他们的受难意识，代代相传。而在现实生活中的悲惨际遇又进一步强化了这种创伤记忆，互为印证，生为犹太人绝非幸事，族裔身份是无形的烙印，时刻警醒着他们现世的艰辛与生存的不易。赫索格因父母的哀伤而愁苦，因家庭记忆而感知自己家族沉重的受难史。这种历史性的代际创伤让他对自我存在的价值、身份的追寻发出了意味深长的感慨。“我过去的岁月，年湮日渺，真像比埃及的历史还要久远”（187）。这不仅仅是赫索格个人的岁月，也是所有犹太人旷日持久的流散历程，他将个体的创伤体验与整个的犹太历史结合在一起，从而使得个体记忆有了厚重的历史感和更为久远的凝视。

这已然成为一种共同的受难意识和家庭记忆注入到赫索格的心中，作为联系他与兄弟姐妹们的情感纽带，加强了他们的家庭认同感和责任感。小说中写道，赫索格认为这是苦难教育，因为家族的受难史被父母讲述过无数次。不同于父辈的沉默不语，赫索格面对创伤时，以一种幽默的开放心态自嘲。这使得他能够客观地审视家庭的受难经历。作为大学教师和知识分子，赫索格有着自觉的反省意识，他站在历史的高度自觉地将整个赫索格家族的苦难纳入到犹太民族的受难史中去，认为他们延续了这种受难经历。《圣经》中记载了犹太人出埃及、圣殿被毁等诸多历史事件，自古以来他们厄运连连，经历被驱逐杀戮毁灭的种种灾难，赫索格家庭的不幸遭遇只是历史记忆中的脚注而已。相较于历史的惊涛骇浪，他们的际遇不过是浪尖上无足轻重的泡沫。然而无可否认的是，“历史的回忆成为集体身份认同的源头”（《回忆空间》81）。对于犹太民族身份的集体认同感强化了赫索格的忧患意识。对于赫索格而言，这是历史性的代际创伤，他们重蹈了先人的命运。可是这又不仅仅是历史性的代际创伤，同时也是家族性的创伤的代际传承。正因为如此，赫索格认为自己有责任记忆下来。这不仅仅只是父亲乔纳作为个体的犹太人遭受的苦难，更代表了所有犹太人的命运。赫索格渴望铭记父亲的受难史，因为这是他作为儿子传承家族史的责任。他从中看到了做人高贵的尊严。

赫索格承袭了来自家庭的代际创伤，深受其影响，并将其纳入历史视野中加以审视。他不仅在面对被背叛的境遇时与父亲乔纳的处理方式如出一辙——回避问题，同时也洞悉到自身深重的身份危机。

二、创伤叙事的真实性与不可靠性

经历代际创伤的赫索格面临着深重的精神危机，从赫索格面对马德琳婚

外情带来的心理创伤时的应对措施可以发现他经历了几个不同的阶段：回避问题、自我否定、创伤叙事、找寻自我，其中创伤叙事对于疗救赫索格的精神危机尤为重要。这部书信体小说上承欧洲文学史上书信体小说的写作传统，下启现代书信体小说之先河，作者将现代派的叙事手法与其相融合，创新精神蔚为可观。赫索格通过书信表达言说的创伤叙事既具有真实性，同时也有着不可靠性，而这恰好反映出人性意蕴的复杂矛盾。

如果说回避问题在相当程度上源自于赫索格的代际创伤造成的影响的话，那么在这之后，赫索格被迫承认自己被欺瞒受伤害并进入到第二阶段——自我否定。赫索格对自己、他人和世界的信任感全面瓦解，他的自尊心被羞耻感、自卑感和负罪感无情地践踏碾压，已经丧失掉处理亲密关系的能力。不仅之前与外界建立的有序联结被摧毁。他的自我认知也发生了逆转。他从亲情、爱情、友情以及才智、灵魂等各个方面对自己进行了全方位的否定，甚至对自己予以了严厉的道德批判：“道貌岸然，坏事做绝，他写道，伪装正经”（29）。这种自我贬低除了加深他的精神危机和自责感之外并无益处。

前两个阶段的赫索格面临着创伤后精神的全面崩溃，之后，他开始重新建立与外界的联结，由此进入了第三阶段，通过四处写信来倾诉烦恼和忧伤，这事实上是创伤叙事。赫索格需要宣泄、释放创伤带给他的愤怒、痛苦和焦虑种种负面情绪。然而必须指出的是，赫索格不是一个完全世俗化了的普通犹太移民后裔，他具有多重身份：犹太移民后裔、美国公民、高级知识分子、大学教授，身份的复杂多元将他与庸常之辈区别开来。赫索格有着深邃丰沛的精神世界，他对于现实生活的体悟和感受要比他人深刻得多。正因为如此，在现实生活中赫索格找不到可供自己倾诉并与之深度交流的对象，只有将目光转向了精神世界中的人们，在由书信构建的虚拟空间中尽情地单向度的表达自我。“与他人分享创伤经历，是重建生命意义的先决条件”（赫尔曼 64）。小说中他总共写了 119 封未曾发出的信，身为大学教授、知识分子，赫索格内在的精神世界无限宽广复杂，他的收信人上至上帝、总统、哲学家，下至死者、服务生，遍及社会中的三教九流，无所不包，而他的论题包罗万象，涉及政治、历史、记忆、经济、文化、哲学、人口学、精神病理学、伦理道德、爱情、婚姻、家庭等诸多领域。赫索格以自己的方式与外界进行沟通交流，他期望以此探究自身族裔身份的渊源、家庭记忆和历史记忆施加于人身上的深刻影响。然而虚拟空间中的人们毕竟无法与赫索格达成真正的共识，他所有的表达得不到任何的回应。显然赫索格对于是否得到呼应并不在意，因为他写就的是不曾发出的信。他需要的仅仅只是书写和表达本身，这已然成为意义之所在。从积极的方面来看，赫索格天马行空的自由想象恰好提供了自我治愈的手段，使得他不再仅仅专注于婚外情事件带给他的创伤，暂时逃离了卑微渺小的自我。尽管赫索格一直深陷精神的牢笼，受到囹圄之苦，然而一旦认识到创伤造成的毁坏不是永久性的，那么赫索格也就有了重构身份及

其新生活的可能。

赫索格过往的生活被摧毁，价值观和人生观亦遭到创伤事件的破坏。他必须自我调整，在创伤叙事中表达出最真实的感受。赫索格在现实的观照中深感作为知识分子的挫败和无足轻重，他甚至无法对任何人解释自己的遭遇。实际上，他的困惑与愤慨并存，不得不面对两个无解的难题：为什么？为何是自己？世间任何现存的伦理道德和律法秩序都无法给予公正的答案。赫索格意识到，过度的思虑与焦灼无济于事，马德琳的不忠与格斯贝奇的背叛的确已经对他造成了无可挽回的精神创伤。然而补救之道在于行动，赫索格最终必须面对真实的自我。作为离异中年男子，赫索格不再拥有家庭的归属感和安全感，这不仅意味着他需要思考创伤后的生活价值，还要重建正义、秩序和伦理，更重要的是必须面对加害者和背叛者马德琳与格斯贝奇，重构新的自我以及与他人之间的联系。119封书信如同一种治疗仪式，这是赫索格的精神自白，给予他复原的力量，恢复从前感知情感的能力，赋予生命新的意义和价值。在赫索格的创伤叙事中，屈辱和羞愧终将为尊严所取代，发掘出坚不可摧的内在生命力。

赫索格的创伤记忆的固然真实可感，之后的创伤叙事也有其真实性的一面，然而需要特别指出的是，由于作者采用了第三人称有限视角进行叙事，换句话说，小说以赫索格的视角在观照世界，因而读者只能以赫索格的眼光看待其他人物，无从得知他人的真实想法，只能据此推测。赫索格的创伤体验诚然是真实的和个性化的，然而由于叙事视角的局限，我们无从知晓在同一事件中除赫索格之外其他人的创伤经历和真实体验。从这一角度而言，赫索格的创伤记忆具有不可靠性。“回忆的进行从根本上说是重构性的；它总是从当下出发，这也就不可避免地导致了被回忆起的东西在它被召回的那一刻会发生移位、变形、扭曲、重新评价和更新”（《回忆空间》22）。人的记忆是有自我防护机制的，同时也是有选择性的。选择的同时也意味着对于其他未被选择事件的遮蔽和掩饰。因为人们的经历可能相同，但是经验却并不一致。这也就意味着在赫索格的回忆空间中存在大量的空白有待他人填补。赫索格曾经在第一段婚姻中出轨数次，然而在他的回忆中对于前妻戴西毫无愧疚之心，也完全没有考虑同样遭遇背叛的戴西是否与自己一样深受精神创伤的困扰和影响。经历第二段婚姻的赫索格由欺骗者变成了受骗者。实际上，读者是通过赫索格的视角看到这桩婚外情事件，却听不到婚姻中的另一方作为妻子的马德琳的声音，无从知晓马德琳是否也在婚姻中经受了精神创伤，所以才借由格斯贝奇逃离赫索格的掌控。在某种程度上她是赫索格经由创伤叙事构建的回忆空间中丧失了话语权的女人。因此，赫索格的创伤叙事有其不可靠性。

无可否认的是，创伤叙事有助于赫索格减少回避性行为以及对痛苦的过度关注和唤醒。这不仅能够使得他将这段经历整合到自己的人生中去，更重

要的在于他无需以此界定自我，评估自己的行为。在经历了伦理两难后赫索格最后选择放弃对加害者格斯贝奇的复仇并不意味着不再寻求公义，恰好相反，这象征着创伤复原的开端，由此他能够摆脱创伤带来的羞辱、愤怒、痛苦和悲伤情绪。

三、创伤复原与家庭记忆的代际传递

经过回避问题、自我否定和创伤叙事这三个阶段历练之后的赫索格开始面对着真实的自我，他真正进入到创伤复原的阶段，最终治愈了精神创伤，与自我、他人、世界之间达成了和解。而令赫索格得到解脱，帮助他治愈精神创伤并找寻自我的是他的家人以及早年全部的家庭记忆，后者以代际传递的方式影响着赫索格的伦理选择并重新建构了他的身份。家庭记忆的代际传递对赫索格精神创伤的复原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有学者指出，“受创者会用许多不同的形式，从家人、情人、好友身上寻求情感上的支持，而且会随着创伤处理过程的变化而改变”（赫尔曼 57）。赫索格最初在情人雷蒙娜身上找寻安全感和信赖感。但是，赫索格遭遇的代际创伤促使他在后来的亲密关系中实施自我防御机制。对于那些痛苦经历刻骨铭心的回忆有助于人们“避免日后重现痛苦、危险和担惊受怕的情形”（转引自德拉埃斯马 22）。出于对创伤事件的恐惧感，他一方面有着寻求保护者和依附于他人的渴望，另一方面又竭力避免任何唤起创伤记忆的伦理关系。赫索格正是在自我隔离和渴求依附之间摇摆不定。这种矛盾冲突不仅使得他的内心世界永远处于躁动不安的状态，更影响到他与他者之间亲密关系的积极建构，使得他与雷蒙娜之间只能形成热切然而不稳定的情人关系。赫索格显然并未将雷蒙娜视为平等的约会对象，只不过将其当作性伴侣。同时对她怀有很强的戒备心理，这种戒心在相当程度上源于赫索格经历的离婚事件带给他的创伤记忆。

由此赫索格寻求庇护的对象从情人转向了家人。当他在离婚事件中备受折磨之时，家庭记忆起到了强大的保护、支持和安慰作用。有研究者提出，“人的安全感，或基本的信赖感，是在人生的最初阶段与第一位照顾者的关系中获得的。这种信赖感源于生命本身，并将跟着一个人走完人生旅程。它是所有关系与信念系统的基石”（赫尔曼 47-48）。这种信赖感将帮助个体与他人之间建立起良好的人际关系，从而能够与社会和谐共处，促进自我的统一性和连续性发展。显然，信赖感的产生与最初照顾者的关系密不可分。小说中写道：“下出租汽车时，他想起了母亲，想起当时她怎样用嘴沾湿手帕给他擦脸。……他没有忘记，那一年夏天的早晨，在加拿大那个空荡荡的火车站里，他母亲手帕上唾液的香味”（53）。嗅觉记忆和触觉记忆引发了赫索格的情感联想，母亲给予他无限的爱令他永生难以忘怀。他一直是被照顾得无微不至的孩子，得到母亲全身心的关爱和保护。这形成了赫索格情感中的依恋模

式，而他在成年之后与他人的相处中也一直在追寻和模仿这样的模式。

家庭记忆铸造了赫索格的身份认同感，与其他兄弟姐妹相比，他更加重视亲情，对于原生家庭有着不同寻常的依恋情感，并且形成了依恋模式。每当赫索格遇到伦理困境或者精神危机时，他总会从原生家庭中寻求解救之道。当赫索格他面临牢狱之灾时，打电话给哥哥威利请求帮助，最终是威利将他保释了出来。赫索格从家庭里汲取温暖的力量和爱的关怀。成年之后的赫索格回忆起童年时代以及家族里的每一位成员，尤其是他的祖父。赫索格没有见过祖父，并没有关于祖孙共处的回忆以强化彼此之间的情感联系和伦理关系。但他无数次看到祖父和亲人们寄来的信件。阿莱达·阿斯曼曾指出：“阅读父亲和祖父的文字意味着：将自己置身于他们的境地；通过接受他人的视角。这里发生了一种情感的换位，一种在距离中的再次经历，因为这里经受的是他人与自我在认知和情感上的不一致”（《记忆中的历史》70）。在父母的信件阅读中赫索格发生了情感上的置换，不仅真切地感受到父亲作为儿子听到老父亲倾诉死后身躯无处安放的痛苦，无法亲自陪伴其右的悲伤，也亲眼目睹了母亲接到兄长死讯时的可怖反应。赫索格在祖辈和父辈的回忆中发现了自我存在的根源，这是无法回避的家族史，每一个个体都置身其中，成为生命链条中的重要一环，连接着过去和未来。个体生命存在本身的意义之一就在于传承古老文化。

赫索格的家庭记忆也展示了每一个成员社会地位与身份的变迁。叙述者采用了回顾性视角在叙事，成年的赫索格多年后站在旁观者立场回首往事，对于自己的家庭，特别是兄弟姐妹有着深刻的洞察和犀利的评价，然而所有这些个性上的缺失并不妨碍赫索格对家人倾注了满腔的温情与关爱。这正显现出幽微人性的真实复杂。亲情从来并不单纯，交织着纷争吵闹、利益争斗和彼此的厌弃，也夹杂着真心实意的爱护与温存。从叙述中可以看到，赫索格所需要的是来自家庭内部的情感：夫妻之情、父子之情、母子之情以及手足之情。而这种“家庭的情感也不是用母亲的照看、父亲的天赋权势，或者兄弟姐妹日常的共居就能解释的。超越并支配所有这些因素的，是实际当中起作用的一种情感，它既模糊又精确，仅在家庭内产生，并且也只能由家庭来解释”（哈布瓦赫 98）。事实上，赫索格家庭成员在长大成人后走上了各自的生活道路，瑞拉和威利作为第二代犹太移民后裔顺利完成了美国化的进程，他们成为拜金主义的百万富翁。赫索格则更多地保留着犹太性的一面。这并非指他遵循犹太文化传统成为犹太教信徒，恰好相反，他与兄弟姐妹们都成为了世俗的犹太人。赫索格的身上展现出来的对于家庭记忆的眷恋和依赖正是犹太性的一个侧面。

赫索格具有复杂多变的伦理价值取向，由犹太传统伦理与美国实用主义伦理混杂而成，当他面临不同的困境和利益冲突时，不同的伦理取向会占据上风。事实上，赫索格在回忆中将个体的遭遇和命运纳入到了古老的犹太伦

理秩序之中，“在这种秩序里，单个的人并不把自己看作个人，而是看作一个姓氏的承载者，一个链条中的一环。他从全体那里得到他的身份认同，也是全体的一部分。个人是转瞬即逝的，而家族留传的血脉和姓氏却是永生不死的”（《回忆空间》79）。赫索格认同源远流长的犹太民族身份，他的名字摩西正是最为突出的表征。摩西原型体现了圣经文学中富有献身精神的希伯来英雄，而贝娄笔下的摩西·赫索格印证了20世纪美国文学中的反英雄人格。这二者之间存在着深厚的文化关联。

综上所述，赫索格对于世界最初的信任和联结源自于家庭，这是他生命的本源之所在，而他最终也仰赖于此获得拯救。赫索格不再是孤立无援的离异男人，也不再是单枪匹马面对困境的失败者，关键时刻他的兄弟姐妹们都伸出了援助之手。“家庭一般来说总是能够成功地激发起成员之间的互爱，即使彼此分离，即使远隔千山万水也不能阻断这种爱，而且，家庭成员也把他们的主要的感情力量都投入到家庭的怀抱里，这已经够不同寻常的了”（哈布瓦赫 99）。必须指出的是，赫索格不得不自己承担创伤复原的责任。的确不公平，但这是行之有效的发挥主体能动性的方式。赫索格摆脱了自我蔑视的心理状态，不再自怨自艾，重新找到了自我，重建了与他人之间的信任，修复了受损的自尊。

正如有学者指出的那样，“被回忆的过去永远掺杂着对身份认同的设计，对当下的阐释，以及对有效性的诉求”（《回忆空间》85）。赫索格对于创伤进行的回顾性叙事就本质而言是他追寻自我、重构身份的过程。在赫索格的无意识深处，隐藏着对于犹太祖先们历史创伤代际传递的审视与悲悯，同时也经由犹太史观照赫索格家庭乃至自己的受难史，其中贯穿着对于复杂多变人性的思考。整部小说就是关于大学教授摩西·赫索格如何治愈精神创伤的回顾性书写，结尾处赫索格不再对任何人发出任何信息。“没有，一个字都没有”（438）。这意味着他与周遭世界的和解，心灵创伤的愈合以及回归田园生活的安宁祥和。赫索格克服了精神创伤带来的消极作用，自我与现实终于能够和谐共处。

Works Cited

- 阿莱达·阿斯曼：《记忆中的历史：从个人经历到公共演示》，袁斯乔译。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17年。
- [Assman, Aleida. *The History in the Memory: from One's Experience to Public Demonstration*. Trans. Yuan Siqiao. Nanjing: Nanjing UP, 2017.]
- ：《回忆空间：文化记忆的形式和变迁》，潘璐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6年。
- [—. *Memorial Space: the Forms and Changes of Culture Memory*. Trans. Pan Lu. Beijing: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2016.]

索尔·贝娄：《赫索格》，宋兆霖译。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1年。

[Bellow, Saul. *Herzog*. Trans. Song Zhaolin. Shijiazhuang: Hebei Education Press, 2001.]

Briere, John & Catherine Scott. 《心理创伤的治疗指南》，徐凯文 聂晶 王雨吟 张怡玲译。北京：中国轻工业出版社，2009年。

[Briere, John & Catherine Scott. *Principles of Trauma Therapy: A Guide to Symptoms, Evaluation, and Treatment*. Trans. Xu Kaiwen, Nie Jing, Wang Yuyin and Zhang Yiling. Beijing: China Light Industry Press, 2009.]

杜威·德拉埃斯马：《为什么随着年龄的增长时间过得越来越快——记忆如何塑造我们的过去》，张朝霞译。济南：山东教育出版社，2006年。

[Draaisma, Douwe. *Why Life Speeds Up as You Get Older: How the Memory Construct Our Past*. Trans. Zhang Zhaoxia. Jinan: Shandong Education Press, 2006.]

莫里斯·哈布瓦赫：《论集体记忆》，毕然 郭金华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年。

[Halbwachs, Maurice. *On Collective Memory*. Trans. Bi Ran and Guo Jinhua. Shanghai: Shanghai Renmin Press, 2002.]

朱迪思·赫尔曼：《创伤与复原》，施宏达 陈文琪译。北京：机械工业出版社，2018年。

[Herman, Judith. *Trauma and Recovery*. Trans. Shi Hongda and Chen Wenqi. Beijing: China Machine Press, 2018.]

彼得·莱文：《创伤与记忆》，曾旻译。北京：机械工业出版社，2017年。

[Levine, Peter A. *Trauma and Memory*. Trans. Zeng Wen. Beijing: China Machine Press, 2017.]

Tedeschi, R. G., & Calhoun, L. G. "The Posttraumatic Growth inventory: Measuring the Positive Legacy of Trauma." *Journal of Traumatic Stress* 9 (1996): 455-71.

赵静蓉：《创伤记忆的文学表征》，《学术研究》1(2017): 144-151, 178。

[Zhao Jingrong. "Literature Representation in Traumatic Memory." *Academic Study* 1 (2017): 144-151, 178.]